

田雪原文集  
(二)

中国经济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本书是1991年版《田雪原文集》的续编，收入有关人口学和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文25篇（中文14篇、英文11篇），概括地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取得的多方面成果。其中，作者在借鉴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合理成份基础上提出的“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探讨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以有力的观点和事实，论证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合理性，对于促进其他高生育率国家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 作者传略



**田雪原：**男，1938年8月生于辽宁省本溪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在教育部等国家机关工作，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2—1983年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作访问学者，回国后任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中心改所后任所长），研究员，《中国人口年鉴》主编，《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成员等。

自70年代后期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以来，发表《新时期人口论》、《2000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主编）等专著8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等中、英、日、

俄论文 150 余篇，研究报告 20 余篇，本人独自撰写在 200 万字以上，并在日、澳、荷、比等国作学术演讲受到好评。在这些论著中，他力主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对人口理论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节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人口发展战略，在人口政策制订中发挥了咨询作用；主编中国老年人口、经济、社会专著 3 卷，被誉为超前研究、填补中国老年科学空白的奠基作；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借鉴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合理成份，提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探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他的这些独立的观点和论述引起国内国外和有关部门的关注，1984 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并获首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一等奖等多项。1991 年享有国际权威的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并颁发证书，表彰在人口学、经济学、老年学研究中做出的突出成就，《成功的人》第 15 版介绍了他的业迹。

##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1)
关于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 .....	(17)
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 .....	(27)
中国 1992 年家庭经济与生育	
10 省市调查报告 .....	(37)
技术进步与孩子成本的转移 .....	(55)
“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	(69)
人口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途径探索 .....	(81)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	(107)
生育转变与市场经济	
——对海峡两岸有关人口现象的分析.....	(125)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和	
人口科学研究.....	(137)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老龄问题和	
老年科学研究.....	(151)
论“传宗接代”生育观及姓氏改革.....	(158)
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及其宏观调节基本思路.....	(167)
现代化·老龄化·社会保障.....	(176)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i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	(187)
Costs of Children—Benefit Theory and Population Control .....	(207)

Reform and More Flexible Policies	
Promote Urbanization .....	(224)
A Macro—View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An Analysis of Sampling Survey in 1987	
on China's Population above 60 Years of Age .....	(238)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Promote	
Population science .....	(263)
The Third Population Boom and	
Corresponding Macro—Policies .....	(272)
The Virtuous Cycle of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	(289)
Develop the Economy , Initiate Changes and	
Promote the Benign Cycl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	(306)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st of Children .....	(329)
“Intermediary” Population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	(350)
Report on the Sample Survey on Household	
Economy and Fertility in the Ten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	(369)

## 绪 论<sup>\*</sup>

### (一)

潮，改革潮。当历史跨入 20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席卷全球而来的，是改革的浪潮。这股浪潮冲击着沉睡的大地，也冲击着因工业化而不断升温的热土，一切力图摆脱困境和寻求新的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谋求改革，改革成为时代的风尚，也成为人们最热门的话题。

中国作为东方古国，正在经受改革的冲击、考验和洗礼。远者且不论，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 年代前期和中期成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提前 1 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而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的 20 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贻误了宝贵时间。这中间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诸多原因，但不容争辩的一点是：当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及其管理的改革迅速兴起之时，我们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关起门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无改革开放意识，更无实际之举，从而拉大了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1978 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纠正了“左”的错误，提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2 年十二大以后，改革全面展开，乡村由点到面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国有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推广经营承包制、股份制，全

<sup>\*</sup> 本文原载妙吉才主编《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国城乡形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生动局面。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甩掉贫困落后帽子，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革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展开；政府转变职能等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提到日程，新的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因而改革是波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革命。

那么怎样改革，向着什么方向改革呢？除需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要离开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成功的改革，都毫无例外地需要吸取外来的经验，争取外援，同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我国 10 多年来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建立经济特区，确立沿海一批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形成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带和环渤海，包括 2 亿人口的沿海开放带，闯出一条新的改革与开放结合之路。如今在此基础上，扩大沿边、沿江河开放带，加快内陆省、自治区的开放步伐，更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开放同改革结合起来向着多层次、多渠道、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引向深入。

由沿海、沿边、沿江河走向内地，由沿海 2 亿人口逐渐波及到 11 亿人口的改革开放进程和新的格局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影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当然也会对人口再生产，对国家的人口管理和人口目标，对人口变动的主要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显然，研究改革开放中新的人口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的方略，是实证人口研究的紧迫课题，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参加由沙吉才研究员担任主编、鲁景精副教授担任副主编的《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一书撰写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积极探索，反复修改，提出许多有实际价值的新观点和对策性建议，是对改革开放和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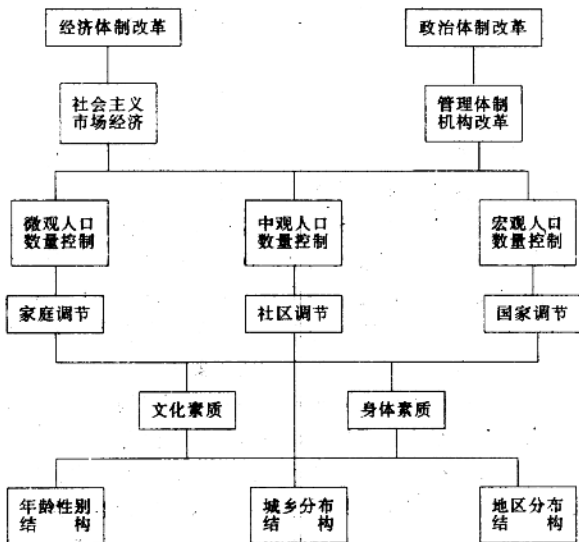


问题的解决的一个实际的推动，脚踏实地的一项具体的努力。

## (二)

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是一个总的题目。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包括本人在内的学术界许多同志认为，主要是人口的数量控制，素质的提高，结构的调节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当实行“控制、提高、调节”的方针。不过这三个方面不是平列的，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人口的数量控制是重点，从解决现存人口问题角度说，数量控制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数量控制有利于素质的提高，并且是调节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主要手段，对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提高和调节也不是消极的，人口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高低直接反映在生育水平上，可以说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城市人口生育率远较乡村低，东南沿海人口稠密地区也比西北人烟稀少地区低，人口城乡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对人口数量控制也有一定作用。至于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属年轻型、成年型还是老年型，对人口数量变动的的影响之大，则冠以增长型、稳定型、减少型概括，决定着人口变动的的基本态势。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探讨以人口的数量控制为主线，涉及到人口素质和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等问题。结合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目标、模式和表现出来的人口问题，以人口的数量控制为主要链条的关系，可表现如下图：

基于上述改革与开放关系的认识和 10 多年来的实践，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相应的开放对人口的影响，可以分别加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相应的开放对人口的影响，表现在：



其一，对人口数量控制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经过 10 多年的摸索，更早一些可从三四十年以前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开始，到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积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法则，其基本的价值观念必然渗透到人口生产中来，给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孩子成本——效益学说提供发挥作用的条件。按照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中的生育行为理论，个人和家庭对孩子的取舍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的边际孩子的成本和孩子提供的预期效益：若净成本为正值，该边际孩子父母不需要；若净成本为负值，需要；若净成本为零，取决于随机因素。尽管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但孩子成本——效益的作用仍客观存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加大了孩子成本——效益作用的效应，在实践中产生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期或者虽然改革进行时间较

长但发展仍较迟缓地区，由于乡村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个体、合营、合资、外资等企业的发展，使丧失已久的家庭生产职能在颇大的程度上得到恢复，养老一保险效益，刺激了家庭生育特别是生育男孩子欲望，阻碍着出生率的下降。众所周知，在中国近 40 多年的人口变动史上，1953—1957 年为一个生育高潮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2.4%；1958—1961 年为一个生育低潮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5%。如以 23 岁作为妇女生育峰值年龄，则 1976—1980 年应为高潮期，1981—1984 年应为低潮期，然而事实上的上述期间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恰好相反，见下表：<sup>①</sup>

单位：‰

年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76	19.9	7.3	12.7
1977	18.9	6.9	12.1
1978	18.3	6.3	12.0
1979	17.8	6.2	11.6
1980	18.2	6.3	11.9
1981	20.9	6.4	14.6
1982	22.3	6.6	15.7
1983	20.2	6.9	13.3
1984	19.9	6.8	13.1

为什么理应为生育低潮期的 1981—1984 年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明显高出理应为生育高潮期的 1976—1980 年的水平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边际孩子效益上升从而刺激人们多生多育，是本源的原因。与此相对应的是，1986—1997 的前后应为受 1962—1973 年生育高潮形成年龄结构影响的新的—次生育高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

潮，然而在过去的6年中人口出生率维持在<sup>21</sup>%至<sup>23</sup>%之间，自然增长率也均在<sup>16</sup>%以下，仅比80年代前期略高一些，并没有形成很高的高潮。这中间除了政府大力加强人口控制，计划生育部门做了许多艰苦工作外，一些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孩子成本—效益发生的某些转变，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包括苏州、无锡、常州所辖县、市在内的苏南地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等多种形式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走出一条经济新发展的“苏南模式”，同时人口数量控制也达到新的水平。1986至1990年的人口出生率均控制在<sup>15</sup>%左右，同世界发达地区水平比较接近，创造了低生育率的人口再生产的“苏南模式”。虽然苏南人口模式的产生有着文化的、政治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经济是基础，由经济发展水平引起的孩子成本—效益的变动是根本的原因。在孩子成本方面，随着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缩小，使得农业劳动力过剩和向乡镇企业转移问题十分突出，转移的重要条件是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从而普遍加大了家庭对孩子的智力投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怀孕和分娩期间的费用也不断上升，因休假和减少工时而减少的收入自然通过影子价格进入孩子成本。这就使边际孩子成本特别是质量成本上升很快，培养一个孩子的周期也大大拉长。另一方面，由于人均收入1989年已达到2470多元，比全国水平高出1倍以上，这就为个人和家庭通过储蓄和寻求保险解决养老创造了条件，也为集体经济壮大后举办养老保险事业提供可能，使得孩子最重要的养老——保险效益显著下降，开始打破“养儿防老”的传统格局。<sup>②</sup>这样，一端是以孩子质量成本为主要标志的孩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另一端是以养老——保险效益下降为主要特征的孩子效益的明显下降，导至人们投向孩子的成本由数量

---

<sup>②</sup> 参见徐国强等《苏南模式下的妇女生育水平及相关因素》、《人口动态》1992年第4期。

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使生育率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初步展示了改革开放对人口转变良好影响的蓝图，代表着发展的方向。目前这张蓝图正在改革开放做得卓有成效的地区铺展开来，由沿海向内地伸展；不过对于多数地区尤其是内地大多数地区说来，尚未走出边际孩子主要效益增殖的阶段，多子多福、多生多育还有着客观的经济基础。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不仅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实现生育转变和谋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治本的方略。

其二，对人口素质主要是文化素质的影响。这个问题同前面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存在着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的客观要求，遂使生育率下降。不过这种转移需要一定的条件，如以  $Q$  代表边际孩子智力投资质量成本， $I$  代表该成本可能带来的预期效益，则可能有三种情况发生：

I,  $Q > I$ ，表明追加的智力质量成本不能带来相应的效益，因而不可能发生转移或者发生了也难以坚持下来。

II,  $Q = I$ ，表明追加的智力质量成本同可能带来的预期效益相当，是可能发生转移的必要条件。

III,  $Q < I$ ，表明追加的智力质量成本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是可能发生转移的充分条件。

那么改革开放对于  $Q$  和  $I$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同样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从理论上说，在改革开放前期和经济、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第 I 种  $Q > I$  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家庭在孩子身上投下的智力文化投资并不能够带来相应的追加效益。相反，由于技术构成比较低，只要将孩子培养到一定年龄，具有一定的体力便可从事一定的劳动，使劳动——经济效益收效早，见效显著，从而障碍着孩子质量成本的上升。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发生中、小学生辍学严重，“花钱念书不如挣钱跑运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现象， $Q > I$  是根本的原因。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科技、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些先进地区将达到第Ⅰ和第Ⅲ种效应，即 $Q \leq 1$ ，从而为增加智力质量成本奠定了基础。在苏南地区，新增人口就业和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乡镇企业，主要是工业企业；但几乎都有一项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即乡镇企业招工条件之一，要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某些企业要求还要更高一些。而且这些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同文化程度、技术熟练程度直接挂钩，体现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的按劳分配原则，反过来激发了人们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的积极性。从总体观察，打开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的大门，仅仅是开始，少数先进地区作了示范，少数落后地区对此还很陌生，大部分地区则处在开始转移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三，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关于人口结构，有所谓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三结构”一说，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这种分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的影响。由于后两个结构将在本文下一部分有所论述，这里仅说明一下对年龄性别结构的影响。前已叙及，家庭生产职能的恢复和强化，增大了边际孩子预期的劳动——经济效益，以及养老——保险效益、继承家业兴衰的风险效益等。显然不同性别的边际孩子的这些效益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男孩子要比女孩子高得多，使得部分人固有的性别偏好有所发展。1990年人口普查表明，总人口性别比为106.6，尚在基本正常范围之内；但是0—4岁组性别比在110以上，5—9岁组性别比在108以上，已显得偏高；内蒙古、山西、湖南等省、自治区总人口性别比在108以上，更显偏高。<sup>③</sup>中国人口性别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有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

<sup>③</sup> 资料来源：《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本文以下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属同一来源。

社会的原因、经济的原因等多种因素。当前值得重视的是，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注意防止人为的性别选择，保持自然生育法则的作用；同时要注意提高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女性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将其纳入改革视野。

中共十四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多年来精兵简政、机构改革方面做出尝试，不能不对人口再生产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以为影响甚微，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政府转变职能，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对现行管理体制和机构进行改革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特别是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加强国家对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而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政策，贯彻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等一整套做法的结果。然而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新形势下，在市场取向和政府转变职能的新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对原有的国家人口控制管理机构构成新的冲击：一是原有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不利于全面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战略的实施，并最终影响到人口数量控制的效果；二是现有的人口管理体制不利于政策上的配套，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矛盾；三是现有的人口管理体制不利于加强对人口科学研究的领导，影响到科研成果效益的发挥；四是现有的人口管理体制不利于对外交往，影响到人口管理的对外开放。有鉴于此，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实有建立国家人口委员会作为人口管理综合部门的必要。人口委员会按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可以充分发挥在人口发展战略方面的协调作用，人口政策和措施方面的协调作用，人口管理办法方面的协调作用，人口科学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协调作用，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二，人口控制机构的转变问题。成立人口委员会是机构改革，还必须要有机制上的改革与之匹配，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要

求。方向是随着孩子成本——效益的有利倾斜和个人生育为利益选择的转变，逐步建立和强化相应的利益调节机制，最终完成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利益调节为主的机制过渡。总结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提出：一是统一超生子女费的征收标准，严格管理制度，有效增大超生子女成本；二是在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基础上，将奖励费转为子女伤、亡的两全保险，并在14年后转为父母的养老保险，有效地增大了独生子女的风险效益和养老——保险效益；三是实行利益导向政策的协调配套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作保证；四是逐步改变脑体分配不尽合理的状况，加速人们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的转移。办法是采取一定的向脑力劳动倾斜的分配政策，诱导人们由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变到追求孩子的质量，提高人们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积极性。通过这些强化利益调节措施的实施，分步骤地实现谁少生孩子谁付出的成本少，得到的效益却比较高；谁多生孩子谁付出的成本多，得到的益并不高。建立这样机制的目的，是促使人们从关心自己利益得失上权衡生育子女的数量，自动选择少生、优生、优教的道路。

其三，建立和健全以社区为主要形式的中观人口管理。自50年代以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推进“社区发展计划”，在促进乡村发展和城市更新，包括人口在内的社会问题综合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转变职能等项改革的加速进行，充任国家人口政策与个人生育行为之间“对接”的中国人口控制的一些做法和管理机制，已很不适应，出现程度不等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应运而生，开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发挥在全面解决人口各种问题中独具一格的作用。

### (三)

改革开放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和作用错综复杂的，然而在作



了上面抽象分析之后，在说明生育与开放的关系，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分别作了分阶段、分层次考察基础上，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线的人口变动的图象和发展趋势，也就比较清楚了。最为重要的，是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的以下一些趋势：

其一，人口数量继续增长的趋势。1978年底大陆人口96259万，到1991年底增加到115823万，增长 $20.3\%$ ，年平均增长 $14.3\%$ <sup>④</sup>。为什么总体人口继续增长？这是由于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轻，1978年以来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阶段，到80年代才完成这种过渡进入成型初期，因而增长势能比较强决定的。同时取决于妇女的生育水平，生育水平又受到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1992》提供的资料，目前世界的总生育率（TFR）为3.4，发达地区为1.9，欠发达地区为3.9；我国1989年即已下降到2.3，应当说我国妇女的总生育率是比较低的。从1980至1990年，世界人口由444800万增加到559200万，增长 $19.0\%$ ，年平均增长 $1.75\%$ ；我国由98705万增加到114330万，增长 $15.8\%$ ，年平均增长 $1.48\%$ ，比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要慢下一截。<sup>⑤</sup>。如前所述，由于改革开放在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开放前期与后期对生育率影响上的差别，人口数量增长也相应反映出来。当前，除个别地区情况特殊外，总体上观察是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和经济发展迅速地区，人口生育率就比较低，象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辽宁、山东等省市总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替换水平以下；改革开放进展较慢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区，生育率就比较高，人口自然增长更快一些。

其二，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趋势。关于人口素质，目前尚存在二要素论（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与三要素论（身体、文化和道德素质或身体、文化和心理素质）之争，但对其变动趋势，主

<sup>④</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sup>⑤</sup> 资料来源：u. 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1992；《1992年中国统计年鉴》。